

管士光

管士光作品集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出版界



中国出版集团



中华书局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出版界

管士光作品集

管士光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士光作品集/管士光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1.3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ISBN 978-7-101-07717-9

I. 管… II. 管…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4113 号

-
- | | |
|-------|---|
| 书 名 | 管士光作品集 |
| 著 者 | 管士光 |
| 丛 书 名 |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
| 责任编辑 | 罗华彤 |
| 装帧设计 | 毛 淳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7¼ 插页 4 字数 416 千字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07717-9 |
| 定 价 | 76.00 元 |
-

出版说明

实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推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重要举措。实施这一工程，旨在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政治坚定，与党同心同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一流的思想理论家、一流的记者编辑主持人、一流的出版家、一流的作家艺术家。为集中展示“四个一批”人才的优秀成果，发挥其示范引导作用，“四个一批”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编辑出版《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文库》主要收集出版“四个一批”人才的代表作，包括理论专著论文、新闻出版、文学艺术作品等。按照精益求精、分步实施的原则，《文库》将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统一封面设计陆续出版。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8年12月

目 录

卷一 文史哲杂论

先秦儒、道、墨、法四家思想述评	(3)
南北朝及隋唐时期佛教主要流派及其思想述评	(27)
反佛思潮的代表:范缜与韩愈	(35)
“程朱理学”简论	(41)
张载及其哲学思想	(51)
中国古代史学的兴起	(57)
诸子百家的史论及其影响	(63)
“前四史”评说	(69)
“三通”浅论	(96)
乾嘉学派:清代三大考史名著	(107)
《文史通义》:古代史学的终结	(111)
唐代社会所存在的异域情调与风气	(115)
唐玄宗其人	(146)
安禄山其人	(158)
漫说《春秋》、《左传》、《国语》和《战国策》	(164)
评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	(173)

卷二 唐代文学散论

论咏物诗	(183)
------------	-------

浅论盛唐边塞诗派的艺术风格	(190)
漫说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的条件	(197)
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晚唐小品文作家作品简论	(203)
从孟浩然的诗看山水诗和田园诗的合流	(212)
高适:唐代诗人之达者	(219)
论李白政治思想的主导因素及其发展历程	(246)
李白生活的时代及初盛唐诗坛	(254)
李白及其诗歌	(280)
浅论李白李贺浪漫主义特色之异同	(297)
岑参:边塞诗写作的“圣手”	(309)

卷三 编辑出版浅论

守正出新:资源整合与选题创新	(337)
从人文社的经营理念谈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	(351)
发挥优势 繁荣出版	
——关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文学出版工作的思考	(357)
认真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做好出版工作	(362)
出版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中遇到的六个难点	(365)
关于软实力的一些思考	
——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实践谈起	(370)
阅读·精品	
——出版社的责任	(375)
关于禁书现象的思索	(378)
温故知新 登高望远	
——人文社古籍图书出版硕果累累	(380)
精益求精为读者	
——写在新版本《红楼梦》第三版出版之时	(383)
社庆三题	(385)

与哈利·波特邂逅

——在香港文化产业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2003年12月19日)··· (389)

“哈迷”,请耐心等待

——一个出版者的话 ····· (403)

感谢与思索

——茅盾文学奖揭晓后的感想 ····· (405)

勇于竞争 坚决维权 ····· (410)

编书人的“幸福时光”

——漫说“作家学术随笔丛书”和“漫说丛书” ····· (412)

和谐的“四重奏”

——介绍四套古典文学丛书 ····· (414)

新的角度 新的概括

——评《中国古代文体丛书》 ····· (417)

印象深刻的四个细节

——读《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 ····· (420)

《浅草集》自序 ····· (427)

编后记 ····· (431)

卷一 文史哲杂论

先秦儒、道、墨、法四家思想述评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大变动时期。由于社会形态的剧烈变化,奴隶主贵族对思想文化的垄断被打破了,因而出现了思想解放的潮流,各种代表了不同阶级、阶层的思想的斗争十分激烈,各种学派不断产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所谓“百家”,并不是实数,前人为了形容流派之繁多、争论之激烈,故用“百家”称之。就学派而言,班固在《诸子略》中归纳为“十家”,主要有六大学派,即儒、墨、道、法、名、阴阳。儒、墨二家产生较早,在春秋末期被称为“显学”。儒家是孔子创立的,到战国时“儒分为八”,代表不同倾向的人物有子思、孟子和荀子;墨家是与儒家相对立的一个学派,由墨子创立,战国时期墨家弟子对墨子思想有所扬弃,形成了“后期墨家”。法家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派,到韩非时更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其他如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公孙龙、惠施为代表的“名家”,在中国哲学史上都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另外,兵家、农家、纵横家也都是一些很有价值的哲学思想。这里仅选主要的即儒、道、墨、法四家作一简要的述评。

一、儒家:从孔子到孟子和荀子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出身于没落奴隶主贵族。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年轻时以替贵族治丧赞礼为生。中年当上鲁国掌管刑法的“司寇”,不久即下台了。孔子曾带着学生周游列国,晚年回鲁国,除教学外,还从事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据说曾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孔子的

思想主要保存在由他的学生记录整理的《论语》一书之中。

孔子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政治思想倾向于保守,主张恢复到西周时期的政治局面。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时代在变革,要完全恢复周礼是不可能的,所以主张采取对旧制度有所损益的改良方法,对新兴势力有所让步,以防止根本性的变革。他力图调和社会变革中的新旧矛盾,这事实上是根本做不到的。因而,他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矛盾心情度过了一生。孔子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恢复周礼,孔子提出“仁”的学说,作为礼的理论基础。对于仁,孔子论述颇多,概括起来是这样两段话: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所谓“仁者爱人”,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要求人们应该互爱,其目的在于调和对立阶级之间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关于“爱人”的具体内容,孔子未做具体解释,但从他的思想体系来看,无非是忠、恕、孝、悌、恭、宽、信、敏、惠等,这些均可以视作“爱人”的具体内容。事实上,抽象的“爱人”是不存在的。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有普遍的人类之爱,阶级利益相反,爱与恨也就不可能一致。如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前一句是说人们不仅要管自己的“立”和“达”,还要想到别人的“立”和“达”;后一句是说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要强迫别人去做。这种“忠恕之道”,是“爱人”的重要内容,却不可能在不同的阶级之间施行,甚至在统治阶级内部也不可能行得通。但孔子借“仁者爱人”提出的社会中人们应该互相尊重对方的愿望和要求的主张,也是对统治者权威的一种限制和否定,自有其积极意义,不应一概否定。正是从“仁者爱人”的命题出发,孔子提出了“举贤才”的主张。在他看来,只有具备了“仁”的品格,才是应举荐的“贤才”。孔子还提出统治者对臣民应该宽厚一点,他认为民不是牲畜,不能任意虐杀,对劳动者应该“先富后教”;同时,统治者还应取信于民。当然,孔子不可能超

越他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他的这些观点却与奴隶主阶级有明显的区别,表达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所谓“克己复礼为仁”,是就个人和社会制度的关系而言的。“克己”,是处处要约束自己;“复礼”,是事事要依周礼而行。在这里,礼是客观规范,而“仁”则是主观意识,“礼”与“仁”的关系相互统一,而有表里、外内、轻重层次之别。“礼”属于外部强制;“仁”属于内心自觉。在孔子看来,不“仁”的人,是不会正确对待“礼”的,因此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坏乐崩”,单纯用礼的条目已经不能规范人们的行动,所以他提出“仁”,目的在于增强人们守礼的观念。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在礼都不被遵守的情况下,要人们“克己复礼”是相当困难的。孔子认为做到“仁”虽然很不容易,但只要持之以恒,发扬主观能动性,还是可以做到“仁”的,即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因此,“克己复礼为仁”的命题,表现出孔子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在孔子思想的影响下,儒家人生哲学注重道德修养上的主动进取精神,十分强调内省体察,后来发展为“慎独”学说。

总之,“仁”是孔子世界观的核心。在他的思想中存在着许多矛盾,他的“仁”的学说,尽管其目的是通过加强宗法关系、调和阶级矛盾以维护等级制度,但总的来看,“仁”的学说在当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先进思想。

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传统的天命鬼神观念,仍将天命视为冥冥中的主宰。在他看来,“天”是人格神,是宗教的上帝。他认为天是百神之主,得罪了它便要遭报应,“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他之所以不被桓魋所伤害,是天在保佑他,因为复兴东周挽救天下无道的大任落在他的肩上,天才保佑他:“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认为天是最高的权威,天命也自然是不可抗拒的,他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否实行,全由天命决定,人是没有办法的,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便是这个意思。因为天命是不可抗拒的,孔子将“天命”放在“三畏”之首:“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具有唯心主义的天命观。

孔子的天道观中同样存在着矛盾,既有消极的一面,又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孔子在宣扬天命观的同时,强调要在人事活动中去体认天命。因此,他强调人事有为,如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里他强调主观努力从事人事活动,下学而上达,和天沟通,而以人事为主。他相信

天命,但又认为贯彻天命却要依靠人的努力,故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强调人事作用时,表现出对天命鬼神的某种怀疑和保留。如樊迟问怎样才是聪明,他回答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子路问“事鬼神”,孔子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死”,答曰:“未知生,焉知死?”由此可见,孔子虽然不是无神论者,但却并不提倡迷信鬼神,他主张对待鬼神既要尊敬又要疏远,而要把人事放在首位,这充分表现出他对鬼神抱着一种回避和存疑的态度。这说明孔子也有重人轻神的思想,这无疑是时代思潮影响的结果。

孔子在认识来源这一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上,持唯心主义的观点。他认为认识是天生的,即主张“生而知之”,他有一段著名的话: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在孔子看来,社会中有一种人,即所谓“大人”、“圣人”,具有先天的聪明才智,他们的知识是生而具有的,是先于经验、先于实践的,而广大劳动人民则是天生的“困而不学”的下等人。他进而认为“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不仅“上智”和“下愚”智力不同,而且双方不会发生转变。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子认为圣凡贤愚是天生的,这就自然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但是,孔子的认识论也充满了矛盾,他虽然赞美“生而知之”,但因为除了一些古圣先王以外,现实生活中根本找不到“生而知之”的人,加之,较深入地接触了社会下层和长期的教育工作,使他承认存在着“学而知之”。事实上,在他的教育实践中,强调的是“学而知之”而不是“生而知之”。他说自己“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要人们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不要固执己见,同时态度要谨慎谦虚,看到自己的不足。据此,他主张在现实生活中,要善于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他认为学习是多方面的,不仅要向“善者”学习,也要从“不善者”那里得到教益。

在强调耳闻目见的同时,孔子还接触到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这种以学为基础,学思并用的学习方法,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的。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深化,学思并重,相互为用。孔子对学与思的论述,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接触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孔子还论述了知行关系,他强调知行统一、学以致用,这种观点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

孔子的认识论具有明显的二元论性质,他一方面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唯物主义命题,在人类认识史上产生了深远和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一些带有唯心主义先验论因素的命题,表现出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给后人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孔子在《中庸》里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说明他是承认事物都有它对立面的矛盾。他主张在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之间,采取折中的办法,既不要做得太过分,也不要做得不够,从而调和矛盾,维护事物旧质的规定性。

孔子在一定程度上看到社会上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难以消除的,因而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但他还是希望用折中的办法使当时新旧之间非常尖锐的矛盾和谐化,就当时的历史现实来看,他的主张自然具有“守旧”的作用。

当然,孔子所要实行的折中、调和并不是没有原则的,而是要以“礼”作标准来调节各方面的矛盾。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此处所说的“和”,即是无过无不及的调和折中,是行礼的根本原则。从本质上说,孔子提倡中庸是由于当时社会变革,“小人”与“君子”对立,肆无忌惮,行为过激,所以他希望通过“中庸之道”调和已经激化的阶级矛盾。一方面为政要“道之以德”,另一方面又要“齐之以礼”,从而挽救奴隶制的危机。

中庸是哲学上的一个大概念,含义甚丰,学术界也有很大争论。有人认为不能把它狭隘地理解为折中调和,而应当从更积极的意义上理解,我个人认为,孔子中庸思想的积极方面,是他首先承认矛盾,并把对立的矛盾概括为“两端”。认为如果只注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个方面,则必然造成危害,这是符合人类认识发展逻辑的。但对矛盾的两端,他却用“执两用中”的办法加以处理,否认矛盾对立面的转化,从而使“中庸之道”具有了形而上

学的本质特征,但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里也包含着某些辩证法的思想材料,至今仍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应该指出,孔子在某些方面也突破了“中庸”的限制,如他认为在学习“故”和“新”是一对矛盾,要有进步,便要突破“故”而向“知新”方面转化。这些思想是带有辩证法因素的。

孟轲(约前 372—前 289 年),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城)人,相传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故常以孔子学说的直接继承者自居。孟子反对暴力,耻言功利,幻想以仁义平治天下。他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把孔子思想改造发展成适合地主阶级需要的意识形态,使儒家学说更加体系化、伦理化,被后世封建统治者尊封为“亚圣”。

孟子思想的主导方面是为封建制服务的,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中心是所谓“仁政”。他认为“仁”的重要内容是“不忍人之心”,从而要求统治者以“仁爱”之心去对待人民,争取民心。由此出发,他提出了“制民之产”的经济方案,即给百姓以私有财产,从而把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以巩固和发展封建经济;同时,他又提出了“民贵君轻”和“保民而王”的政治理论,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

总之,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唯心主义思想,建立起一套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孟子主张性善论,他认为人具有先验的善性,这是他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孟子认为人的本性里都有善的萌芽,他称之为“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他认为“四端”是先天的,扩而充之,就发展为仁、义、礼、智这“四德”。“四德”是“四端”的发展,所以这“四德”都是“我固有之”的,其原因就在于“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引出所谓“四德”,目的在于从人的“善性”来证明宗法道德的合理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人性论和天赋道德观。

孟子的道德观念是以他的性善说为基础的。善与恶是各种道德观的基本范畴和论题。孟子把“仁、义、礼、智”说成是人生而具有的“共同本性”,并进而用这四德作为标准来衡量人们的善恶。孟子认为,人只有“存心”,才能使善性表现为善德,若是“放心”,人虽有善性,却只能表现为恶德。善性之所

以丧失,是后天的原因造成的。这说明,孟子认识到客观环境对人的道德观念有影响作用,这一点在孟子天赋道德观中,是有合理性的因素。

孟子从其道德观出发,将“义”、“利”二者对立了起来。他继承了孔子义利观的传统,把义和利看成是矛盾的东西:“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可见他是贵义而贱利的。在孟子看来,利是万恶之源,利就是不道德,因为追求过多的物质利益,会使人失去善性。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一整套修身养性的方法,以“寡欲”为养心的主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和发展“善性”。由此可见,从孟子对人性善的论述到他提出道德修养的方法,都充分表现出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特点。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他以“诚”为天道,在他那里,“天”作为人世的主宰,具有道德的属性。他承认有一个支配一切、至高无上的“天”存在着。他认为天子传位给下一代,不是由个人意志决定的,他认为“舜有天下”是“天与之”,这是主张君权天授。孟子认为历史上之所以产生重要人物,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他们是受天命而降临人间的。由此可以看出,孟子与孔子一样,是把天命观同英雄史观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孟子一方面维护传统的天命观,另一方面又为它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他以“天下之民从之”、“百姓安之”来解释天意,把“民心”和天意结合起来,这是“重民”思想在天命观上的反映。

在人与天的关系上,孟子将天道与人性合而为一,他用心、性来解释天,给天以道德属性,认为“天”的道德属性就包含在“人性”之中。天德根源于人德,从而构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在孟子哲学中,沟通“天”与“人”的,是既为“天道”内容又为人类最高德性的“诚”。所谓“诚”,也就是修身养性,肯于内省,达到“至诚”,就可以感天动地,改变事物的发展规律了。他概括“天人合一”的思想说: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则知天矣。

在孟子看来,认识并不是从物质到感觉和思想,而是开始于自己的内心,最后才能达到“知天”的目的,即所谓“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从天人合一的主观唯心主义出发,自然得出了“万物皆备于我”这一个夸大人

的主观能动性的唯我论的结论。由此可见,尽心、知性、知天,既是孟子的世界观,又是他的认识论。在他看来,认识只是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探索,从而完全排除了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

总的说来,孟子的哲学思想并不丰富,但它的影响却不能低估,如他内省直觉的先验论、英雄史观、历史循环论以及性善论等,在中国哲学史上都曾产生重要的影响。

荀子(约前 298—前 238 年),名况,又称荀卿或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主要活动于齐、楚两国。他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总结百家之学,建立了影响很大的“孙氏之儒”的儒家学派。

荀子社会政治思想的中心是“隆礼重法”。作为地主阶级思想家,荀子对孔子学说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发展了儒家的礼治学说。他认为礼是“强国之本”,但他所说的礼又与孔子所维护的周礼不同,是为封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隆礼”的主要内容,一是实行“贵贱有等”的封建等级制,他主张以是否符合礼义作为划分等级的标准,从而确定物质分配的“度量分界”;二是以礼义教化来调节矛盾,防止争端,维护统治秩序。

与“隆礼”相适应,他还提出了“重法”的思想:“法者,治之端也。”在他看来,隆礼与重法的目的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地位和作用又有不同。总的说,“礼”是用来节制统治阶级的行为的,“法”则是约束百姓的,这正说明荀子思想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愿望。

荀子的哲学思想充满了唯物主义因素,他是那个时代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

我们知道,唯心主义总是混淆天人关系,在他们看来,天是有意志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天”的安排。针对这种观念,荀子总结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的自然人观,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

荀子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宇宙万物不是神造的,而是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有其固有的法则和规律,因此它并不干涉人的凶吉福祸: